



牛津和剑桥预科生的社会起源和职业模式,1840–1900hisr_470

William D. Rubinstein 威尔
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

抽象的

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教育在现代一直被视为“建立”地位的主要标志。然而,很少有人对牛津剑桥学生的社会起源和随后的职业模式进行搜索研究。本文报道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 1840 年、1870 年和 1900 年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录取的大约 100 名随机选择的学生。总共有 600 多名学生。

关于每个新生的父亲的职业、地位和财富、他们的中学教育以及随后的职业、地位和财富的准确信息是从各种各样的来源收集的,其中许多以前从未使用过。出现的画面是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预科生,很少有地主或贵族。商人父亲的数量也比以前的研究中发现的要多。大多数预科生随后从事与他们的父亲非常相似的职业生涯,在 1840 年和 1870 年的同伙中,有大量的圣公会神职人员。尽管牛津剑桥作为内阁部长和白厅城精英的托儿所的角色,它作为现代英国精英的祖先的功能有些模糊,它并没有自动提供通往最高层的途径。

几个世纪以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直是“英国机构”所暗示的一切的核心。这方面的证据如此广为人知且充足,以至于背诵它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例如,自 1850 年以来,已有 18 个 26 位首相曾就读于两所古老的英国大学中的一所或另一所,而在 20 世纪,60% 的内阁部长是牛津剑桥的产物,大多数高级公务员、法官、圣公会主教和一位不成比例的英国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定义。¹在托尼·布莱尔于 2007 年 6 月辞职之前,尽管近几十年来大学系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首相和反对党领袖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尽管有这一杰出的记录,这对于我们理解英国的精英结构显然很重要,但只有有限数量的研究试图检查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牛津剑桥大学入学者样本的社会背景或职业成果,并且没有一个真正的搜索顺利的方式

¹ 见 H. Perkin,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 in England since 1880* (1989); W. Ellis, *The Oxbridge Conspiracy: How the Ancient Universities have kept their Stranglehold on the Establishment* (1995) 讨论了牛津剑桥的持续优势; W. D. Rubinstein,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igins of British Elites, 1880–1970*, *Past & Present*, cxii (1986), 163–207 (repr. in W. D. Rubinstein, *Elites and the Wealthy in Modern British Society* (Brighton, 1987), 第 172–221 页); J. Scott, *谁统治英国?* (剑桥, 1991 年), 第 124–35 页; J. Paxman, *《高处的朋友》谁管理着英国?* (1991)。

716 牛津和剑桥预科生,1840–1900

超出了从已出版的校友集体传记中所能推断的范围。²在这项研究中,从每所大学 1840 年、1870 年和 1900 年入学的 100 名预科生中随机抽取样本。³然后确定每个人的父亲以及其他传记信息,以及预科生本身的职业、遗嘱认证评估等。⁴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维多利亚时代牛津剑桥预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牛津剑桥教育对其学生的职业机会有何影响这一关键问题。牛津剑桥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英国精英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牛津剑桥是否提高了登顶的机会?牛津和剑桥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吗?

如上所述,本研究中的预科生姓名是从两所大学的预科生名册中随机选择的,并在各种来源中进行了全面追溯。每个案例的目的都是确定每个人父亲的职业、死亡日期和遗嘱认证价值;预科生本身的重要传记数据,包括有关中学教育、职业和职业模式、死亡日期和遗嘱认证评估的信息。

尽管其中一些信息在已出版的参考著作中很容易获得,

² 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此类研究是 MC Curthoys 和 J. Howarth,“起源和目的地:牛津男女的社会流动性”,载于 MG Brock 和 MC Curthoys,《牛津大学的历史》,vii: 19 世纪牛津,铂。2 (牛津,2000 年),第 571-95 页。然而,本文并未使用本研究中使用的资源范围,尽管它提供了有关 1818/19、1848/9、1878/9 和 1897/8 年进入牛津大学预科学生的队列以及牛津大学预科学生的有用信息 1881-1913 年。(本研究不包括女性预科生。她们当然需要一个单独的、探索性的研究,作者希望最终进行这项研究。)当然,Curthoys/Howarth 的文章不包括剑桥预科生。同一卷中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是 JR De S. Honey 和 MC Curthoys,“牛津和学校教育”,载于 Brock 和 Curthoys,第 545-69 页。有关剑桥大学预科生(和教师)的一些信息可在 CNL Brooke 的“The Society”中找到,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v: 1870–1990 (Cambridge, 1973), pp. 240–300, esp. pp. 287–300 以及早期的 P. Searby 的“附录”,剑桥大学的历史, iii: 1750–1870 (剑桥,1997),第 730–45 页。另见 V. Green, The Commonwealth of Lincoln College [(Oxford)], 1429–1977 (Oxford, 1979) 中的附录 (pp. 638–52)。

³ 作者非常感谢两所大学的档案管理员允许他复印(或在剑桥的情况下获得缩微胶卷)1840、1870 和 1900 年的相关预科生名册。该项目由英国学院 (SG 35122),作者对此深表感谢。随后来自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研究基金的小额赠款使他能够完成这项研究,他再次表示非常感激。作者在伦敦的长期研究助理,Dr.

Carole M. Taylor 干练地承担了主要遗嘱认证登记处遗嘱认证估值的大部分研究。

这里使用的预科生的随机样本包括每三个名字,直到每个大学年达到 100 个名字。有时,每个样本中包含略多于 100 个的名字,并且保留了额外的名字。严格来说,这个过程不会产生随机样本,应该通过使用随机数表来获得。但是预科生是按时间顺序记录的,没有明显的模式,作者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假设这里使用的样本不是随机的。1869-70 年剑桥有 2,019 名本科生,1900-1 年有 2,983 名本科生 (Brooke, 第 593-4 页),这表明这项研究为早期的队列使用了大约七分之一的样本,而在 1900-1 年则使用了十分之一的样本。1900 个队列的样本。牛津的学生比剑桥的学生少,这意味着牛津的样本占总数的比例要高一些。

⁴ 两所大学都有著名的大型印刷校友名册 (Alumni Cantabrigiensis: 传记名单……至 1900 年, comp. J 和 JA Venn (2 pts. in 10 vols., Cambridge, 1922-54) 和 Alumni Oxonienses: 牛津大学成员, 1715-1886, comp. J. Foster (4 卷, 牛津, 1887-8))。维恩的宏伟收藏无疑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传记作品之一,而且比福斯特的骨骼记录要详细得多。然而,即使是维恩也并不总是提供关于预科生父亲的足够信息,并且省略了许多预科生的信息(包括死亡日期)。本研究中 1900 年剑桥队列中的许多人在完成维恩的工作后死亡。一些牛津剑桥大学也公布了自己的校友名册。重申一下,这项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已发表的登记册。

牛津和剑桥预科生,1840-1900 717

对于大多数预科生来说,它在任何公开的来源中都没有,必须在其他来源中仔细追踪,包括出生、结婚和死亡证明、当地名录、人口普查记录,以及遗嘱认证日历。这种方法与作者之前对英国精英群体和财富持有者的所有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非常相似,并且这里收集的数据与之前的书籍和文章中的数据完全可比。那么,关于牛津剑桥,我们发现了什么?

评估精英群体的社会出身有多种方法,但没有一种完全令人满意。在笔者以往对精英群体社会起源的研究中,例如对 1840、1870 和 1900 年公立学校入学者的随机样本分析,主要采用了七级社会地位体系,提供了更大程度的社会地位。与其他分类图式相比,地位非常高的群体之间的区别。⁵最高级别的社会背景,第一级,包括顶级土地所有者(拥有 3,000 英亩或更多英亩土地的人);顶级商人,包括所有在 1939 年之前离开 50,000 英镑或以上的人;最顶尖的专业人士(法官、主教、教授等);6 二级包括小地主(1-3,000 英亩或在伯克的地主绅士中提及);离开£10-50,000或担任同等职位的商人;以及中层专业人士、公务员等。

第三级包括小商人、非常低的专业人士和农民。IV级包括下层中产阶级的文员、公立学校的普通教师和小店主。V、VI 和 VII 级包括熟练、半熟练和不熟练的体力劳动者。⁷这种分类模式还采用横轴,将广泛的职业类别分为土地所有者、专业人士和商人。

表 1 显示了牛津剑桥大学预科生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观点。虽然很重要,但地位最高的父亲的数量可能比大众形象所认为的要少;尤其是,大地主的数量比想象的要少,商人父亲的数量要多得多,商人父亲的数量一直在小幅增长。大部分父亲来自社会规模较低的部分,来自普通阶层英国国教的牧师、校长、律师、医生和小商人。这些群体仍然被认为在他们的社区中享有相当的社会声望,但没有国家声望或意义,或巨大的财富。正如预期的那样,在牛津剑桥大学预科生的父亲之间似乎存在着几乎绝对的阶级障碍,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工人阶级,即使在 1900 年的队列中,当时为最有能力和最幸运的工人阶级学生提供了一些奖学金援助。可用的。

虽然两所大学的模式大体相似,但也存在差异,剑桥大学的社会阶层比牛津大学更广泛,甚至可能略低,至少在英国上层和中产阶级的背景下是这样。

在之前对牛津剑桥学生社会背景的研究中,地主的数量可能被高估了,而商人的数量被低估了。例如,MC Curthoys 和 Janet Howarth 对“起源和目的地:牛津男女的社会流动性”的研究,其中

⁵ 参见鲁宾斯坦,“英国精英的教育和社会起源”,特别是。页。178。

⁶ 鲁宾斯坦,“英国精英的教育和社会起源”。所有有头衔的人的近亲,以及所有在议会任职的父亲或祖父的人,也都归类于此。

⁷ 鲁宾斯坦,“英国精英的教育和社会起源”。这些职业名称是每个人获得的最高级别,只要这可以确定。

718 牛津和剑桥预科生,1840–1900

表 1.牛津剑桥大学预科生父亲的社会阶层

剑桥 1840

	土地	专业人士	商业	数字
共	6	1 29 (10.2%)		
二	9	11	2	22 (25.0%)
三	6	34	11	51 (58.0%)
四	3	0 36 (6.8%)		
全部的	24 (27.3%)	46 (52.3%)	18 (20.5%)	88

“先生们”、“独立手段”等 = 3
未知 = 10
已知 = 91
英国国教牧师 = 21 (23.1%)

剑桥 1870

	土地	专业人士	商业	数字
共	3	5	16	24 (26.1%)
二	7	21	7	35 (38.0%)
三	2	23	7	32 (34.8%)
四	0	0 11 (1.1%)		
全部的	12 (13.0%)	49 (53.3%)	31 (33.7%)	92

“独立手段”等 = 4
未知 = 5
已知 = 96
英国国教牧师 = 30 (31.3%)

剑桥 1900

	土地	专业人士	商业	数字
共	0	4	12	16 (16.3%)
二	1 (1.0%)	24	16	41 (41.8%)
三	3 (3.1%)	23	10	36 (36.7%)
四	0	0 33 (3.1%)		
五	0	0 22 (2.0%)		
全部的	4 (4.1%)	51 (52.0%)	43 (43.9%)	98

先生们 = 1
未知 = 1
已知 = 99
英国国教牧师 = 19 (19.4%)

牛津和剑桥预科生,1840-1900 719

表 1.续。

牛津 1840

	土地	专业人士	商业	数字
我	3	10	6	19 (20.7%)
二	11	19	5	35 (38.0%)
三	1	31	5	37 (40.2%)
四	1	0 01 (1.1%)		
全部的	16 (17.4%)	60 (65.2%)	16 (17.4%)	92

绅士 = 1
未知 = 10
已知 = 92
英国国教牧师 = 31 (33.7%)

牛津 1870

	土地	专业人士	商业	数字
我	7	2	8	17 (17.5%)
二	5	10	6	21 (21.6%)
三	4	45	10	59 (60.8%)
全部的	16 (16.5%)	57 (58.8%)	24 (24.7%)	97

未知 = 4
已知 = 97
英国国教牧师 = 24 (24.7%)

牛津 1900

	土地	专业人士	商业	数字
我	3	5	20	28 (28.6%)
二	3	13	8	24 (24.5%)
三	0	33	12	45 (45.9%)
四	0	0 11 (1.0%)		
全部的	6 (6.1%)	51 (52.0%) 41 (41.8%)		98

绅士 = 2
已知 = 100
英国国教牧师 = 12 (12%)
除非另有说明,IV-VII 级没有示例。

检查 1818/19、1848/9、1878/9 和 1897/8 年进入牛津的预科生，发现男性入学者的父亲被描述为“地主，没有专业”，分别为 23%、23%、18% 和 12%。⁸ 这些始终高于本研究中发现的地主父亲的百分比。

⁸ Curthoys 和 Howarth,表 24.1,p. 578.

720 名牛津和剑桥预科生,1840–1900

可能 正如在此类分析中常见的那样 被描述为“JP”、“DL”或类似名称的居住在乡间别墅中的父亲被认为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而实际上许多人是当地的律师或商人。然而,在本次研究中,真正的地主数量实际上相当少,地主贵族的比例几乎为零。例如,在牛津 1870 年的样本中,只有四位预科生父亲被称为土地贵族,其中一位是在他的一生中创造出来的。⁹ 尽管其他三人是无名的大地主,但真正拥有大量土地的土地父亲的数量肯定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少,而且两所大学都在稳步下降。在剑桥 1900 年的队列中,样本中没有一个父亲是真正的大地主。

相反,在以前的研究中,商人父亲的数量被低估了。在 Curthoys 和 Howarth 的研究中,被描述为“企业(所有者/经理)”的男校生父亲的比例分别为 12%、9%、18% 和 27%。¹⁰ 这些似乎大大低于实际百分比,特别是对于本研究中三个队列中的最后一个,牛津和剑桥超过 40% 的父亲是商人。¹¹ 这些低估的原因可能在于预科生或校友名册的不情愿,记录所有的商人-父亲,尽管维恩的剑桥校友名册通常既坦率又搜索。然而,使用当地名录,遗嘱认证记录和诸如董事名录等作品证实了商人父亲越来越多。

本研究中的一些预科生来自中产阶级的最低部分,但只有极少数。 Gwilym Ungoad Thomas (1879–1959) 的父亲是 1900 年剑桥大学预科生,是 Llanelli 锡制品厂的翻滚工。他著名的同学赫伯特(后来的赫伯特爵士)爱默生(1881–1962),最终于 1933 年至 1938 年成为旁遮普省州长,然后是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是西柯比的斯蒂芬爱默生的儿子,柴郡,在他儿子的出生证明上被描述为“养狗(家养)”,1900 年留下了 121 英镑;他的母亲在出生证明上被描述为“园丁”。

这种显着向上的社会流动性还有其他一些例子,但并不多,而且肯定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几。

⁹ 即查尔斯,第二代加瓦男爵(爱尔兰同僚);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爵士,第 8 营;弗朗西斯,第九代贝德福德公爵;以及格拉斯哥地主威廉·华莱士·霍齐尔(也是克莱门汀·丘吉尔夫人的叔叔),他于 1898 年被创建为第一代纽兰兹男爵。1900 年英国约有 700 名同龄人(其中 591 名在 1900 年有权坐在上议院)。如果每个人平均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就读于牛津剑桥,那么在 30 年的一代人中,任何一年大约有 47 人进入牛津剑桥,或者每所大学每年大约 23 人。因此,与牛津剑桥预科生总数相比,这里的样本与我们的样本大小一致。这里的重点是,能够进入牛津剑桥的贵族子弟数量非常少。

大多数牛津剑桥学生远非贵族或富有,这是牛津剑桥学者的常识。根据剑桥伊曼纽尔学院院长彼得·吉尔斯(Peter Giles)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没有注明日期,但显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写成的,“经常有人抱怨说,牛津和剑桥的寄宿大学的教育成本使他们成为可能只为富人。这从来都不是真的,而且在任何时候,大部分学生都是从神职人员、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儿子那里选拔出来的,他们常常难以以为儿子提供大学教育”(引自 TEB Howarth, *Cambridge Between Two Wars* (1978 年),第 65 页)。

¹⁰ 柯索伊斯和豪沃斯。

¹¹ 小店主和店员的数量 包括在 Curthoys 和 Howarth 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牛津大学的同伙中共有两个,剑桥有 9 个。

大多数牛津剑桥大学预科生的父亲是职业男性,尤其是英国圣公会牧师,他们占总数的近四分之一。剑桥所有父亲的 285 名中的 70 名 (24.6%) 和 289 名中的 67 名 (23.2%) 所有牛津的父亲。直到 19 世纪后期,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仍然是牛津剑桥大学预科生中最重要的单一部分。然而,在 1900 年的队列中,圣公会神职人员的父亲迅速减少,1870 年剑桥父亲的比例从 31% 下降到 19%,同期牛津的父亲比例从 25% 下降到 12%。

其余的职业父亲来自广泛的坚实的传统的中产阶级。例如,在 1870 年剑桥队列中,八名父亲是律师、两名大律师 (一名法官)、五名专业军官、两名教师和一名医生。其中一位 (亨利·格里菲思牧师,欧内斯特·霍华德·格里菲思 (Ernest Howard Griffiths, 1851-1932 年) 的父亲,后来成为威尔士大学的副校长) 是布雷肯一所独立学院的独立部长和校长。像他一样,随着大学对非圣公会教徒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在预科生的父亲中也出现了一小部分但稳定的非圣公会神职人员。¹² 例如,1900 年的牛津队列包括卫斯理会、公理会和自由教会的儿子苏格兰部长和拉比,而 1900 年剑桥队列包括两名公理会成员和一名长老会 (在北爱尔兰) 部长的儿子。¹³ 教堂和庄园的儿子以及牧师的儿子在场可能已经弥补了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后代数量的下降。

对现代任何一群英国人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的一种更常见的模式通常是他们的中学教育,这可能是因为这在标准参考文献中比他们父亲或其他亲属的职业更容易追踪。“精英”公立学校的教育,尤其是著名的老公立学校,如伊顿公学、哈罗公学、温彻斯特公学和橄榄球公学,总是被视为与该公学的阶级背景、地位和财富几乎共同定义和准确的代表。男人的父亲和家人。虽然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准确的,但使用中学教育来推断学生的社会背景也带来了许多困难。可以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公立学校都迎合了中产阶级而不是上层阶级:只有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从真正的贵族和非常富有的人中吸引了大量的学生。¹⁴ 预科生的中学教育本研究中的情况如表 2 所示。

可以看出,在任何来源中都找不到早期队列中相当大一部分的中等教育。虽然可以追踪的牛津预科生比剑桥预科生少,但即使是对维恩的非常仔细的研究

¹² 众所周知,直到 1870 年代初,牛津大学的预科生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都必须在继续学习或获得学位之前表明他们接受英国国教的三十九条。一些非英国国教徒总是准备好接受这些考试以获得入学或毕业资格,但当然,他们的人数在 19 世纪后期会有所增加。

¹³ 拉比是南安普敦和曼彻斯特的伊西多尔·西蒙,他的儿子莱昂 (后来的爵士) 西蒙 (1881-1965 年) 成为 GPO 储蓄银行的董事,并在 1950 年至 1953 年期间担任以色列邮局银行的总裁。他在牛津大学的成功。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 Balliol 的古典学,并获得了爱尔兰和克雷文奖学金。说明了 1870 年代改革后老牌大学的非凡开放性。

¹⁴ WD Rubinstein, 资本主义、文化和英国的衰落, 1750-1990 (1993), 第 102-39 页; 鲁宾斯坦, “英国精英的教育和社会出身”。

722 牛津和剑桥预科生,1840–1900

表 2.牛津剑桥预科生的中学教育,按人数

	1840		1870		1900	
	剑桥	牛津	剑桥	牛津	剑桥	牛津
伊顿公学	4	10	6	9	6	13
耙	4	3	12	4	6	4
温彻斯特 221458						
橄榄球 454502						
克拉伦登登机 532010						
克拉伦登天 544128						
[C、C、M、W]*	0	0	8	7	10	11
其他顶级登机	4	2	12	4	30	21
其他顶天 637688						
其他学校	24	6	14	7	27	25
未知	41	65	31	54	5	2
全部的	100	102	100	101	100	100

* 切尔滕纳姆、克利夫顿、马尔堡、惠灵顿。

和他的同事无法确定大量早期的中学教育
剑桥预科生。大概这些未知数都没有参加过“精英”活动
然而,公立学校,可能所有参加过这种“精英”的预科生
学校已被追踪。

在公认的精英中学上学的人数出奇地少,
不到 6% 的预科生上过伊顿公学,不到 4
% 的人在哈罗接受过教育。大多数牛津剑桥预科生都受过教育
在一所学校里,在大众心目中,社会声望较低。
切尔滕纳姆、克利夫顿、马尔堡和惠灵顿的人数众多,
可能是 19 世纪成立的最负盛名的公立学校
世纪,以及低于最顶尖的一系列优秀公立学校中的任何一所。 15较小的
上过文法学校的人数,以及范围广泛的小型公立学校
代表。这里的调查结果似乎与美国的统计数据非常一致
预科生父亲的社会阶层:出奇地少,至少相比之下
以大众形象,出自真正的贵族、富豪或高级
和有声望的专业人士,但许多来自中下层
类,其中牧师、校长、律师等占多数。这是
也与 Honey 和 Curthoys 的结论相当一致,他们发现
1895-8 学年和 1911-14 学年在牛津大学入学的男性中有 59%
在一所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有 12% 到 13% 来自“边缘”
公立学校。 16使用稍微不同的标准,他们还发现每人 54
% 的牛津预科生和 52% 的剑桥预科生
1902-4/5 进入公立学校,另外 12 到 13

¹⁵ 例如,在 1900 年的剑桥,预科生来自以下“好”的公立学校
(包括寄宿和白天),未在表 2 中的其他地方分组:贝德福德、伯克汉姆斯特德、布瑟姆、布伦德尔斯、
Bradfield, Dover, Dulwich, Eastbourne, Felsted, Highgate, Malvern, Mill Hill, Oundle, Radley, Repton, Rossall,
塞德堡、汤布里奇、大学学院和阿平厄姆。
¹⁶ 蜂蜜和 Curthoys,p。 552.

“边缘”公立学校的百分比。17在这项研究中,在公立学校就读期间在 1840 年到 1900 年之间肯定增加了
在一所非常有声望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那些在流行中被视为同义词的人贵族或巨富的心智,根本没有明显增加,而且肯定从来没有超过所有预科生的少数。

追踪预科生自己的后续职业生涯会呈现出许多历史学家的困难。对于牛津大学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牛津与维恩的校友 Cantabrigiensis相比,校友名册是骨架和不足的总的来说,这是非常详细的。尽管如此,通过采用一系列来源包括人口普查和遗嘱认证记录、本地和专业目录、死亡证书等,关于几乎 100% 的职业的信息剑桥样本和90%以上的牛津样本已获得。这在表 3 中列出,格式与预科生父亲的数据相同。

可以立即看出,绝大多数的牛津剑桥预科生六个同伙都变成了职业男性。令人震惊的是,超过 60% 的两所大学的 1840 名学生成为圣公会牧师寻找那些不熟悉之前研究的人
18 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在随后的同伙稳步下降,但在两所大学,仍然有近 20 人

表 3.牛津剑桥预科生的社会阶层

剑桥之子 1840

	土地	专业人士	商业	数字
一	3	2 27 (7.1%)		
二	7	8 17 (17.2%)	2	
三	6	69	0	75 (75.8%)
全部的	16 (16.2%)	79 (79.8%)	4 (4.0%)	99

未知 = 1
英国国教牧师 = 66 (66.7%)

剑桥之子 1870

	土地	专业人士	商业	数字
一	4	11	7	22 (22.2%)
二	5	19	0	24 (24.2%)
三	2	50	1	53 (53.5%)
全部的	11 (11.1%)	80 (80.8%)	8 (8.1%)	99

独立手段 = 2
英国圣公会牧师 = 38 (38.4%)

¹⁷ 蜂蜜和 Curthoys,p. 554. 作者没有提供早期的统计数据,也没有提供任何区别伊顿公学和其他非常有声望的公立学校。

¹⁸ 尤其参见 A. Haig 的重要研究The Victorian Clergy (1984)。本研究的结果是与黑格的那些非常相似,第 335-48 页。

724 牛津和剑桥预科生,1840–1900

表 3 续。

剑桥之子 1900

	土地	专业人士	商业	数字
共	0	13	7	20 (20.2%)
二	1	29	6	36 (36.4%)
三	1	39	3	43 (43.4%)
全部的	2 (2.0%)	81 (81.9%)	16 (16.2%)	99

独立手段 = 1
英国国教牧师 = 20 (20.2%)

牛津之子 1840

	土地	专业人士	商业	数字
共	1	6 29 (9.9%)		
二	4	17	1	22 (24.2%)
三	4	56	0	60 (65.9%)
全部的	9 (9.9%)	79 (86.8%)	3 (3.3%)	91

未知 = 11
绅士 = 1
英国圣公会牧师 = 61 (59.2%)

牛津之子 1870

	土地	专业人士	商业	数字
共	5	6	2	13 (15.1%)
二	2	12	0	14 (16.3%)
三	2	56	1	59 (68.6%)
全部的	9 (10.5%)	74 (86.0%)	3 (3.5%)	86

“独立手段”等 = 7
未知 = 7
英国圣公会牧师 = 2,394 (41.9%)

牛津之子 1900

	土地	专业人士	商业	数字
共	3	9	5	17 (18.5%)
二	3	23	9	35 (38.0%)
三	1	39	0	40 (43.5%)
全部的	7 (7.6%)	71 (77.2%)	14 (15.2%)	92

独立手段 = 2
未知 = 7
英国国教牧师 = 19 (18.8%)

1900 个分组中的 1%,可能是最大的单一职业目的地。大多数神职人员毕业生是教区牧师和校长,在非常普通的文职职位上服务多年,没有留下任何公共标记。19一些人升入圣公会等级,成为教规、教区长、农村教务长等,而一定比例的人加起来从事学校教学或校长职位的文职工作。20一些人通过撰写学术著作或历史著作或参与宗教辩论而大放异彩,但他们的人数很少。

1840 年的同伙 本应在 1843-4 年毕业的人 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宗教信仰的顶峰时期、在关于“牛津运动”的全国辩论期间以及在英国圣公会教职人员人数迅速上升的时候进入了圣公会教堂。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可以让年轻的毕业生进入高地位,可能是终身职业,从一开始就支付收入,尽管收入微薄。21许多神职人员,尤其是农村社区的神职人员,被视为事实上的绅士制度的一部分,并且几乎自动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然而,到本世纪末,神职人员减少了很多,专业职业范围扩大了很多。例如,剑桥 1900 年的毕业生在其毕业生中看到了一系列现代且熟悉的职业生涯。二十人成为圣公会神职人员,八人成为大律师,六人律师,十名医生或外科医生,三人进入家庭公务员制度,九人成为印度或殖民地公务员,两名成为外交官,八名校长,五名大学学者和三名职业军官,而少数职业,包括会计、气象学和新闻学,则吸引了个人。22

无论是早期的文职职业,还是后来更加多样化的职业道路,如上所述,大多数牛津剑桥毕业生都进入了这个职业。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在经济和社会历史学家之间争论不休的中心问题,即所谓的“大出血”。成功商人的儿子中的“天才”。

根据对英国企业家精神的著名且经常被重复的批评,成功、顽固、通常是白手起家的维多利亚商人的儿子,尤其是实业家,定期在领先的公立学校和两所古老的大学接受教育,获得古典作为“绅士”的教育完全不适合他们在商业生活中的坎坷。MJ Wiener 可能是这一观点最著名的代表,特别是公立学校(而不是大学)声称,“无论有多少商人的儿子进入,这些学校中出现的未来商人寥寥无几,而那些这样做的人是“文明的”;即脱离一心一意追求生产和利润”。23作者对社会的分析

¹⁹ 例如, (Revd.) Thomas Dove (1821-1906; 剑桥 1840) “四十四年来从未在 Cowbit [林肯郡] 参加主日礼拜”(维恩)。他的同学 (Revd.) Henry Kirby (1818-97) 以及之前的父亲和后来的儿子在 1810 年至 1912 年间连续 102 年担任苏塞克斯郡梅菲尔德的牧师(维恩)。

²⁰ 例如, (Revd.) George Butler (1819-90 年; 牛津 1840 年), Harrow 校长 (Revd.) George Butler 的儿子, 他成为利物浦学院的校长, 但可能通过他的妻子、妓女活动家 Josephine Butler 更为人所知。

²¹ 尽管没有人脉广泛的赞助人的年轻神职人员的回报往往非常微薄,正如黑格 (Haig) 第 54-71、249-76 页所表明的那样,从许多神职人员留下的通常很小的庄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²² 这位记者正是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 (Alan Alexander Milne, 1882-1956 年), 他在 1906 年至 1914 年期间担任 Punch 的助理编辑, 但当然, 作为小熊维尼 (1926 年) 的作者而声名远播。他还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和剧作家。

²³ MJ Wiener, 英国文化和工业精神的衰落, 1850-1980 年 (Harmondsworth, 1981), p. 31.

726 牛津和剑桥预科生,1840–1900

表 4.按队列划分的商人父亲和新生

剑桥	父亲们	预科生
1840	18 (19.8%)	4 (4.0%)
1870	31 (32.3%)	8 (7.9%)
1900	43 (43.9%)	16 (16.0%)
小计	92	28
牛津	父亲们	预科生
1840	16 (17.4%)	3 (3.3%)
1870	24 (24.7%)	3 (3.5%)
1900	41 (41.0%)	14 (15.4%)
小计	81	20
两所大学合计	173	48

1840年八所主要公立学校入学者的背景和职业模式，1870 年和 1900 年,以与这项研究几乎相同的方式组织和研究
牛津剑桥大学发现，
自己从事商人事业的商人儿子的数量，
尽管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似乎虽然
在这项研究中,568 名公立学校入学者的父亲是商人,329 名儿子（58%）效仿他们的
榜样。 24 大学群体中的下降
然而,正如表 4 所表明的那样,这一点要陡峭得多。

因此,代际人口减少了约 71%
作为商人的职业选择,大大高于公立学校
精确地同时采样。牛津的下降比在
剑桥。就像职业的儿子和从教堂搬到一个
职业选择更加多元化,商业生活似乎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在 19 世纪末期比以前更容易接受和普遍。

商业职业出现这种非常显着的代际下降的原因是
可能很复杂。十九世纪末在牛津剑桥的出席率是
仅限于选择参加的几千名年轻人中自我选择的少数人
（或几乎没有选择），而不是进入就业（或培训，
例如,作为律师或军官）离开学校后。大多数人
家族企业需要,或希望从事商业事业,会做
所以在十八岁时没有上大学。可能是最理智的
有能力的学生上了一所大学,几乎所有有圣公会的年轻人都上过大学
宗教承诺。与公立学校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一样，
代际衰退的一个原因可以说是人口持续增长
错觉,商人的第三、第四和第五个儿子,对商人来说是多余的。
家族企业,上过大学并进入专业领域。²⁵ 另一个主要因素是

²⁴ 鲁宾斯坦,资本、文化和衰落, p。 120.

²⁵ 鲁宾斯坦,资本、文化和衰落, p。 121.

牛津和剑桥预科生,1840-1900 727

许多职业人士的儿子（无论他们是否上过大学）只是追随他们父亲的脚步，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进入教堂、法律、军队或公务员队伍。

尽管如此，也有许多特定于大学生生活的因素，这些因素肯定会影响商业职业的选择。在 19 世纪的牛津剑桥，大学和商业生活之间没有现成的联系：就目前所知，没有商业招聘人员或职业顾问。甚至与商业无关的科目，如经济学，在本世纪末之前都很少有学生选修，而且缺乏较早的荣誉课程的声望。许多贫困学生从一开始就迫于需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且承担不起从事冒险活动的费用。直到 18 世纪 70 年代或更晚，英国圣公会的宗教信仰对旧大学的中心地位也可能不利于商业职业的选择，尽管这肯定需要更多的经验证据。

然而，牛津剑桥的教育并不总是与商业生涯的巨大成功相矛盾，即使在这些有限的样本中，也有一些受过牛津剑桥教育的商人的杰出例子。例如，乔治·约翰·芬威克（George John Fenwick, 1821-1913 年；牛津 1840 年）是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一位银行家的儿子，他在 1852 年去世时留下了 6,000 英镑。儿子成为了领先的银行家（兰布顿公司）和酿酒商在纽卡斯尔，在他去世时留下了 110 万英镑；他无疑是英格兰最富有的商人之一。Charles Micklem (1882-1959; Oxford 1900) 是巴西铁路公司秘书的儿子，他成为杰出而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并且是为数不多的入选牛津国家传记词典的人之一。样本中最著名的商人可能是沃尔特·利夫（Walter Leaf, 1852-1927 年；剑桥 1870 年），他是纽约市出口仓库管理员的儿子；他成为伦敦和威斯敏斯特银行的主席，并且是伦敦商会的创始人之一。Leaf 是一位著名的古典主义者（他制作了《伊利亚特》的新译本），是一位将学习与商业头脑结合起来的有教养的城市人的典型例子。这种结合也不可能只在“绅士资本主义”的更文雅的城市世界中出现，甚至在工业和制造业中也可以看到。查尔斯（后来的查尔斯爵士）曼德（1852-1929 年；剑桥 1870 年）成为著名的油漆和清漆制造商家族企业曼德兄弟的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并担任伍尔弗汉普顿市市长四年。在越来越多的案例中，这种成功的职业选择是可能的。

对父子职业地位的比较也提出了本研究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牛津剑桥的教育对其学生的最终地位有何影响？矛盾的是，就获得最高排名而言，答案似乎是牛津剑桥教育略微减少了非常优秀的进入者的数量。这是因为许多牛津大学预科生的父亲自己都是从社会上层走出来的，或者有取得了很高的地位，是他们的儿子根本无法比拟的。即使是贵族或非常富有的父亲的后代，这些通常也是继承权很少的小儿子。从表 1 和表 3 中可以看出，在 6 个队列中的 5 个中，被归类为最高身份 I 的儿子比他们的父亲少（剑桥 1900 名儿子除外）。剑桥学生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但牛津预科学生的下降幅度更大。在状态 II 的父亲和儿子中也有类似的明显下降，同样，六个队列中有五个显示下降（牛津 1900 年除外）。当中状态

728 牛津和剑桥预科生,1840–1900

III 父子,大多数同伙 (牛津 1900 年除外)显着增加,产生了如此多的儿子成为非常普通的圣公会牧师、校长、小殖民官员等的影响。

诚然,代代相传的社会向上流动有一些非凡的例子,而且必须认识到,取得巨大成功的不一定是非常成功的父亲的儿子。当然,在我们的样本中,在公共生活中取得惊人成就的最毋庸置疑的例子是总理赫伯特·H·阿斯奎斯 (Herbert H. Asquith, 1852-1928 年),他偶然出现在我们 1870 年牛津大学预科生的样本中。阿斯奎斯是约瑟夫·迪克森的儿子阿斯奎斯是约克郡莫利的一个小型公理会羊毛制造商,他在儿子 8 岁时去世,只留下 450 英镑。通过亲戚的慷慨解囊,阿斯奎斯得以进入伦敦金融城学校,这是一所优秀的日间公立学校,校长特别开明,他成为本杰明·乔维特在 Balliol 的明星之一,之后开始了作为英格蘭领先大律师之一的职业生涯,并最终总理。

这些样本中的其他预科生也在一系列活动中名列前茅,例如法官、公务员常任副秘书长、大使和主教。在这些仅 600 人的随机样本中,可能有八到十个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至少对一些人来说,其中包括探险家和作家理查德·伯顿爵士 (Sir Richard Burton, 1821-90; 牛津 1840); 作曲家查尔斯·维利尔斯·斯坦福爵士 (1852-1924; 剑桥 1840); 法律历史学家亨利·缅因爵士 (1822-88 年; 剑桥 1840 年); 并且,如前所述,AA Milne。²⁶然而,这些都是例外,而不是规则。

还可以提供有关父亲和预科生的财富的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伦敦主要遗嘱认证登记处的遗嘱认证估值来衡量的。²⁷它们的使用存在局限性:它们只记录死亡时的财富;虽然存在 1858 年之前的遗嘱认证估值,但它们并不位于一个地方,而且使用困难意味着此处不能包含 1858 年之前的估值; 1898 年之前的所有土地,以及从 1898 年到 1925 年的所有定居土地,都被排除在估值数字之外,必须从其他来源进行估算。然而,它们确实提供了关于现代英国任何个人或群体财富的唯一一致信息,并且是客观和全面的。²⁸ 本文追踪了本研究中所有预科生及其 1857 年后去世的父亲的遗嘱认证估值。虽然只有少数早期父亲可以被追踪,并且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遗漏,因为后者的队列几乎可以找到所有遗嘱认证估值。²⁹

²⁶ 其他人的关系也更间接地值得注意:这些样本中的人是父亲 Graham Wallace 和 Ian Fleming,以及 Josephine Butler 的丈夫 (见上文,n. 20)。

²⁷ 这些记录了自 1858 年以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经过检验的所有庄园的价值。它们目前在伦敦 High Holborn 的 First Avenue House 举行。如有必要,这里的表格中还添加了一些苏格兰和爱尔兰遗嘱认证人。

²⁸ 《牛津国家传记词典》经常记录自 1858 年以来每个死者的遗嘱认证估价。关于遗嘱认证估价,参见 WD Rubinstein, *Men of Property: the Very Wealthy in British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81); 和鲁宾斯坦,资本主义、文化和衰落,第 102-40 页。

²⁹ 例如,在剑桥的父亲和预科生中,追踪的数字如下:1840 年 父亲 31 人,预科生 91; 1870 年 父亲 85 人,预科生 100 人; 1900 年 - 父亲 87 岁,儿子 94 岁。除了在 1858 年之前去世外,未能追踪估价的原因还包括一些名字的普遍性、可能移居国外以及合法或事实上的姓名变更。追踪这些估值的艰巨工作大部分由卡洛尔·泰勒博士完成。必须认识到,这项研究中许多人的死亡日期无法从任何已发表的来源获知,并且必须在年度遗嘱认证日历中单独追踪,通常需要多年,并且需要艰苦而艰巨的工作。

表 5.父亲和新生的遗产价值

房地产的中值 - 当前值				
剑桥		父亲们	预科生	父亲/儿子的百分比
	1840	16,630 英镑	5,128 英镑	30.8%
	1870	12,800 英镑	9,059 英镑	70.8%
	1900	7,752 英镑	9,420 英镑	121.5%
牛津		父亲们	预科生	父亲/儿子的百分比
	1840	27,500 英镑	4,000 英镑	14.5%
	1870	9,297 英镑	3,627 英镑	39.0%
	1900	10,841 英镑	19,971 英镑	184.2%
不动产中值不变				
剑桥		父亲们	预科生	父亲/儿子的百分比
	1840	16,224 英镑	5,636 英镑	34.7%
	1870	11,658 英镑	5,141 英镑	44.1%
	1900	5,134 英镑	2,610 英镑	50.8%
牛津		父亲们	预科生	父亲/儿子的百分比
	1840	25,000 英镑	4,365 英镑	17.5%
	1870	10,535 英镑	2,231 英镑	21.2%
	1900	7,268 英镑	1,921 英镑	26.4%

表 5 记录了父亲留下的遗产的遗嘱认证估值中值
预科生和预科生本身,包括当前和常数项。³⁰
由于全面的可追溯数据仅存在于 1858 年,因此这些表格省略了许多
早期的父亲。土地的资本价值,不包括在遗嘱认证估价中,直到
1898 (未定土地)和1926 (已定土地),已从归还
1872-5年土地所有者。从这些表格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牛津剑桥的教育确实做到了
不会带来经济上的成功;事实上,在恒定的条件下,牛津剑桥的预科生
大多数病例比他们的父亲死得更穷。有几个原因。高的
税收 (和避免遗产税),再加上几乎无休止的通货膨胀
二十世纪,大量庄园的数量不断减少,直到
十九八十年代。同样重要的是,预科生的典型职业模式,
看到大多数人,包括商人父亲的儿子,成为次要的专业人士,
支付了通常微薄且全额征税的薪水,与经济成功背道而驰。那里
当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但总的来说,后来的成就
在牛津剑桥的学生中,很少考虑经济上的成功。

这里发现的图片具有讽刺意味和奇怪的矛盾:而牛津剑桥
产品主导了政治和白厅精英的重要部分,以及

³⁰ 不变的估价取 1865 年和 1885 年的平均值为 100,根据卢梭价格指数
BR Mitchell 和 P. Deane, 《英国历史统计摘要》(剑桥,1971 年),第 471-3 页。

730 名牛津和剑桥预科生,1840-1900

司法机构、英国圣公会,或许还有伦敦金融城的高级领导人,大多数牛津剑桥大学预科生的职业生涯都没有任何真正的成功,更不用说精英地位了。由于这些预科生的父亲中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杰出的男性,因此在牛津剑桥接受教育似乎并没有增加他们后代获得极其成功的职业的数量,尽管这与那些确实达到了top 自己(如 HH Asquith)可能来自普通的社会背景。牛津剑桥并没有提供一条通往最高职位的“王道”,尽管牛津剑桥教育肯定是一个普遍观察到的标志,可能是晋升至最高职位的候选人。1850年后,在主要公立学校和牛津剑桥的教育实际上取代了贵族头衔和土地面积,或与旧贵族的密切关系,成为英国人口爆炸和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的主要特征。³¹然而,这样的教育并不能保证成功,这与往常一样,是人才、运气和环境的产物。高层并不总是有空间,而且非常高级的名额也很多。根据定义,总是比不那么尊贵的队伍小。

牛津剑桥教育也不是在所有精英群体中上升到最高职位的关键,即使在那些明显属于“体制”的群体中,无论定义如何。例如,在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37位英国高级领导人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就读于牛津剑桥,而牛津剑桥毕业生在众多精英职位持有者中显得尤为罕见,从领先的实业家到律师等专业团体和医生。不用说,工会和工人阶级精英(尽管牛津剑桥的毕业生肯定在工党的领导层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大部分,尤其是在1935年至1985年间)。英国的精英领导层从来没有接近过种姓,即使精英职位持有者的背景看起来最相似,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例外。³²

³¹ 关于牛津剑桥和英国的精英,见斯科特;以及 WL Guttsman,英国政治精英(1963年)和 D. Boyd,精英及其教育(温莎,1973年)等著作。

³² 鲁宾斯坦,“英国精英的教育和社会起源”。由于篇幅和样本量的限制,一些重要的话题无法在此讨论,例如各个牛津剑桥大学预科生之间的不同职业模式。可能很明显,Balliol 男子比其他大学的毕业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但这还有待证明。

Copyrigh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s the proper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and its content may not be copied or emailed to multiple sites or posted to a listserv without the copyright holder's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However, users may print, download, or email articles for individual use.